

创造性社会心理学

〔美〕 特丽萨·M·艾曼贝尔 著

方展画 胡文斌 文新华 编译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责任编辑 徐 炯

封面设计 闵 敏

创造性心理学

〔美〕特丽萨·M·艾曼贝尔 著
方展画 胡文斌 文新华 编译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

(上海淮海中路622弄7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市印刷三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8.25 字数 163,000

1987年6月第1版 1987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40,000

书号 2299·010

定价 1.70元

目 录

第一章	创造性社会心理学的现状·····	1
第二章	创造性的涵义与测量·····	25
第三章	约定俗成的创造性测量技术·····	49
第四章	理论框架(上)·····	77
第五章	理论框架(下)·····	93
第六章	评价对创造性的影响·····	119
第七章	奖赏和工作强制对创造性的影响·····	145
第八章	社会促进、示范作用和动机定向对创造性的影响·····	170
第九章	其他社会—环境因素对创造性的影响 ·····	199
第十章	怎样提高创造性·····	228
第十一章	建立一门综合的创造性社会心理学·····	249
编译后记	·····	260

第一章 创造性社会 心理学的现状

当代教学方法没有使神圣的探究好奇心完全窒息，这不啻是个奇迹，因为除了兴奋作用以外，这个娇嫩的幼苗主要生长于自由的需要之中；没有这种需要，它就必然会遭致毁灭。认为探究的乐趣能凭借压制的手段和某种责任感来促成，那就是大错特错了。

——爱因斯坦

上述这段坦率的令人吃惊的话引自爱因斯坦的自传，爱因斯坦道出了将在本书中不断重复的主题：主要因为社会因素能影响动机，所以，社会因素对创造性具有强大的影响。

为了理解创造性，必须提出两个基本问题：创造性活动是怎样区别于一般活动的？最利于创造性活动的条件是什么——什么样的个人能力和特征，什么样的社会环境？我希望本书能为创造性的社会心理奠定基础。基于这个努

力,我将着重于第二个问题,即考察最有助于创造性的社会条件。然而,在考察社会因素对创造性活动的影响时,也有必要考虑创造性不同于一般活动的一些方面。所以,整本书将围绕着上述两个问题而展开。

第一节 创造性研究中的“沟裂”

产生创造性社会心理学有两个原因。第一,显而易见——以前没有这样一门学科。有关的理论匮乏,只有少量关于特定社会和环境因素对创造性的影响的研究文献,更重要地,对这样一类影响的结果,实际上没有任何的实验研究。

在1950年,《心理学摘要》列于“创造性”栏目之中只有十一篇选文,占所摘论文总数不到0.2%。在1960年,这个栏目相当于总数的0.4%。在1966年占0.8%。到了1972年,创造性论文的比例达到1%。尽管这些研究很少是实验研究,而且,涉及社会心理因素的实验更是凤毛麟角。在1976年到1978年间,《实验心理学杂志》、《心理学评论》以及《实验心理学》没有发表有关创造性的论文。被认为同创造性有关的研究,一篇刊于《认知心理学》,一篇刊于《心理学通报》,四篇刊于《个性和社会心理学杂志》。可是,在同一时期不注重实验的杂志上,却发表了六百余篇创造性论文。

如果认为创造性研究人员并未着手研究社会心理对创造性活动的影响(事实上,他们显然没有这样做),那么,他

们在干什么呢？在以往三十年中，创造性研究主要是强调创造性人才的个性研究。这种强调直接为吉尔福特（J. P. Guilford）在 1950 年预言（或者说推动）：“心理学家研究的问题是创造性的个性问题。”

这些研究采用了一些不同的形式。第一种长期研究的方法包括对创造性人才的传记和自传进行研究，努力确定他们独特的智力和个性特征。第二种考察创造能力个别差异的方法是对一个或几个创造性人才进行精密的实验研究。麦金诺（D. W. Mackinnon）等人 1962 年在伯克莱^①的“个性评估和研究研究所”进行的研究便是这种方法 的 样 板。这些研究者对被同事提名为创造性的艺术家和科学家进行了“现场”估测。在一个周末，上述每一位艺术家和科学家接受许多人的正式访问，并且完成很多的个性测验、智力测验和创造性测验。最后，用许多流行的创造性测量量表来测试普通的人。然后将科学家、艺术家同普通的人进行比较，找出差异。

有些创造性研究热衷的不是一些个别差异问题。例如，纽厄尔（A. Newell）等人 1962 年曾考虑过创造性必需的认识技能。他们描述了解决问题的信息加工途径，在这种途径中，创造性活动被认为是应用启发打破认知背景，萌发新思想。他们利用以电子计算机为基础的人类智能概念，对创造过程进行相对深奥的描述。与纽厄尔等人的方法相比较，其他一些涉及知识性技能的研究工作绝大多数

① 伯克莱（Berkeley）是美国加州西部的一个商埠。——编译注

都是理论性不强的，依赖于浅显的创造过程概念，偶尔也依赖于工业和教育的经验发现。在这一类研究中，奥斯本(A. F. Osborn)1963年提出来的“大脑暴风骤雨”方案是典型的并且也是家喻户晓的研究：一套规则或启发方法，作为产生创造性解决问题途径的指南，教予他人；然后，将接受过该方案训练的人产生的观念同没有接受过该方案训练的人产生的观念作比较。

最后，还有一些研究考察了特定的社会或心理环境对创造性的影响。某些研究将两组来自不同环境的人在创造性测验中获得的成绩进行比较。例如，开放教室^①同传统教室的比较；大城市的教室同小城市的教室的比较。其他有一些研究利用传记材料研究家庭、宗教对杰出人才创造性的影响；或者利用历史资料去发现滋育或压抑创造性的社会、政治及文化环境。

于是，创造性最活跃的研究领域是描述活着的或古代的杰出创造性人才以及广为人知的创造性人才的特征，要不就是描述在创造性测验中成绩优异者和成绩低劣者在个性和智力上的差异。这些研究大多是基于这样一个假设：创造性人才的特征基本上是天生的，这些特征一目了然并且令人信服地将创造性人才和无创造性的人区别开来。

热衷于个别差异的结果，实际上是忽视了某些尚未明

① 开放教室是近几十年来国外教学改革中出现的一种教学形式，主要特征是强调以学生为中心，强调学生自发的活动。——编译注

了的但又是探索创造性十分重要的领域。人们倾心于创造人才本身的特点，排斥了“创造性情境”——即有助于创造性的环境。人们偏重于创造性的内部决定因素，排斥了外部决定因素。并且，在内部决定因素的研究中，人们又明显地侧重于“遗传学的”因素，排斥了来自学习和社会环境的影响。

在许多方面，先前的创造性研究，基本上不同于社会心理学所追求的目标。对杰出创造性人才个性特征的研究，关心的是鉴别这些人身上被精确描述的一些特征。在这种目标上，这些研究已经获得某种意义上的成功。为了能确定将那些在创造性测量中得心应手的人和茫然失措的人区别开来，这些研究同样也关心对个人特征的描述，或者说关心对创造性人才的预测，在这个方面，先前的研究也获得某种成功。研究创造过程的认知心理学家业已分辨出人类认知系统的某些操作程序，它们似乎大有可能导致别出心裁的和有用的解决问题的途径。同这些研究相比较，创造性社会心理学者在鉴别特定的社会条件，这些条件或积极地或消极地影响着极大多数人的创造性。

第三节 一些社会心理学轶事

比起仅仅只是这一领域研究极其缺乏的原因来，产生创造性社会心理学的第二个原因是：社会和环境的因素，在创造性活动中似乎扮演了一个关键性的角色。有相当可观的日常证据表明，社会心理因素对杰出人才的多产和创

造性有显著的影响。这类证据，绝大多数来自科学家、艺术家、作家和另外一些举世公认的具有创造性成就的人的自传、信函、日记和其他第一人称叙述。的确，利用这些资料作为实际的心理现象证据，务必要小心翼翼。美国女诗人罗厄尔(A. L. Lowell)就表示怀疑：创造性天才是否具有洞察自己的创造性能力——

在回答怎样作诗这个问题时，我本能的答复是坦率的：“我不知道。”当这个问题向我提出时，只是指我自己的诗作。关于它们是如何写出来的，我同其他人一样，茫然无所知。对它们所知道的，仅仅是该知道的百分之一。在感动了意识的地方，我与它们邂逅相遇，这已沿着构思过程走完了相当一段路。

然而，认为第一人称的报告是产生一门创造性社会心理学背景材料的合理来源，有三个理由。第一，引用材料的兴趣不是集中在对思维过程的主观反省上（如同罗厄尔所指出的，这样做肯定是不精确的，或者至少是不完美的）。相反，兴趣主要是集中在创造性人才对社会因素的报告上，这些因素曾撞击着他们，并且撞击着对他们接踵而来的工作的策略或禁锢。第二，这些报告仅仅被用来作为有关社会因素假设的原始资料，不是作为对这些假设的验证。最后，如果某些因素被创造性人才作为重要因素反复列举，那么，尽管各人对社会和环境的影响会作出不同的反应，还是有可能分辨出一种真正的现象来。

一些创造性人才已经提供了关于他们日常工作生活的

大量记叙，并且洞察到能产生影响的社会因素（不必惊诧，这类叙述——尤其是描写的更为详尽的叙述——大多来自于作家）。在许多这一类报告中，社会力量作为有害于创造性的力量被引述的。

创造性活动的第一人称叙述中，包含了本书所思考的主要问题的大量证据。这个主要问题是：为了自身的目的而从事某项工作，能促进创造性；为了满足外部目标而从事某项工作，能削弱创造性。这种内部动机和外部动机之间的比较，在这些叙述中不断出现，鉴于这些显而易见的重要性，它在后面几章中也不断出现。

一、艾尔伯特·爱因斯坦：从外部控制到内部控制

虽然，爱因斯坦(A. Einstein)对他的工作和生活写的很少，但他记载的那些材料包含着一个时常碰到的主题：他的科学兴趣，推测起来就是他的创造性，受到外部强制力量的损害。在少年时代，他就读于德国一所组织严密的军国主义学校，在那里，考试期间的压力是如此地压迫着他，以致一度使他失去了对科学的兴趣。而科学，即使在那个年月，也是令人心驰神往的。“这种强制对我具有如此威慑的影响，以致在通过最后的考试之后，我发现，对任何科学问题的思考，都会令我厌恶整整一年。”

当爱因斯坦十五岁时，由于种种原因便逃离了这个管理严密压制个性的学习环境，他离开了慕尼黑到苏黎世，希望在那里的一所技术学院中就读。然而，使他大失所望的是他没有通过入学考试。他只好在一所瑞士人办的补习学校里求学。根据一位爱因斯坦的分析家霍尔顿(G.

Holton)1972年的观点,这一段插曲象征着爱因斯坦学校生涯的一个转折点,并且也可能是他科学思想的转折点。同他已熟悉的东西形成鲜明的对照,这所学校是以人道主义为方针的,强调个人无妨碍地探求知识。这种社会气氛,极为适宜于爱因斯坦独特的思维和工作风格。这所学校不强调记忆,十分强调个人的实验室工作和由学生发起的调查研究活动,大力发展师生之间轻松和民主的交流。在爱因斯坦弥留人间之际,他深情地回忆起这所学校:“它给我一个刻骨铭心的印象,感谢它的自由主义精神和老师们的坦诚真挚,这些老师把自己摆在没有外部权威的基础上。”正是在这所学校,爱因斯坦设想了第一流的“思想实验”,它导致了爱因斯坦发明相对论。

许多创造性人才,都随时准备抵制企图支配他们的各种外部压力。例如,爱伦(W. Allen)说过,他乐意将自己的工作看成坦率正直的丑角式人物和一个作家,而大为不愿看成是一个刻板的电影剪辑者,因为其他人对剪辑工作的各个方面有很大的支配权。如同许多具有高度创造性的人一样,爱伦回避他感到被迫去做的工作,但是热衷于从事满足自己兴趣的工作。当他还是个儿童时,他定期逃学。他去纽约大学只读了一个学期,就因为考试不及格而退学(他在大学里不能通过的课程包括电影制作)。从很小的年龄开始,他始终如一地抛开别人对他的成绩的指望。他不是去上学,而是去美国的曼哈顿闲逛,观察路人,或者去魔术百货商店,或者看电影。他不去迎合别人对他所受教育种种看法,而是自己教自己电影剪辑、音乐、文

学、哲学、历史和变戏法。一天晚上，当他因为影片《安妮·霍尔》而被授予奥斯卡奖时，他正在做每个星期一晚上他总要做的那些事，而不是去接受社会的承认——他在曼哈坦岛^①同他的爵士小组在一起吹奏单簧管。

对外部强制因素的抵制，在英国作家劳伦斯(D. H. Lawrence)的信件中也是昭然若揭的。他写信给一位朋友：“我始终认定，我的座右铭是‘艺术为我’。如果我想写作，我就写——并且，如果我不想写，我就不写。”苔兹(J. C. Dates)认为，她写作的诱因是内心的惬意，这是读到什么好东西时引发的：“我写作，去发现那就是我将要写下来的东西。对阅读的爱好刺激着写作的愿望——以致一个人能作为一位读者阅读她写下的词句。”毕加索(P. Picasso)说：“当我们发明立体派艺术时，我们并没有发明立体派的意图，仅仅只是具有表达我们所感受东西的愿望。没有人能草拟一个行动方案，虽然我们的朋友——诗人们有礼貌地跟随着我们的努力，但他们决不能支配我们。”

即使是圣芳济派的修道士，也天天要求亲戚、朋友和同事作为削弱社会强制的因素发挥作用。高度创造性的人才势必要经常抵御来自这些人的外部控制。狄更斯(C. Dickens)去函答复一位朋友的邀请时直率地指出这一点：

“这仅仅是半个钟点”——“这仅仅是一个下午”——“这仅仅是一个晚上”，人们三番五次地对我说；但是，他们不知道，有时候，支使某个人

① 曼哈坦岛位于美国的纽约湾内。——编译注

的自我去消磨任何约定的和安排停当的五分钟，这是不可能的——抑或，仅仅是一种约定的意识有时候会整整一天折磨着人。这些是为偿付著书的损失而遭致的惩罚。一个献身于艺术的人，必须把自己心甘情愿地整个儿地奉献给它，去艺术中寻找报偿。如果你怀疑我不想见你，我会感到伤心。然而我不得不这样做。总之，我必须走我的路。

二、安妮·塞克斯顿：对付外部强制

在塞克斯顿(A. Sexton)写给朋友、同事和亲戚的信中，她对写作的基本态度溢于字里行间：一种高度稳定的动机，即一种写诗的动机，主要是因为这是她乐意去做的事情。她以前在家里当家庭主妇，二十八岁那年，有一次看完了一个“怎样写一首十四行诗”的教育电视节目，马上决定试一试。从此乐此不疲，以致在她余下的四十六年中，从未中断诗歌创作。写诗先是成为她强烈的业余爱好，后来成为她的职业。她着手搬掉各种障碍，包括那位四处奔波的推销员丈夫、两个年幼的孩子、家务事，并且不断地同严重的抑郁症作斗争。在塞克斯顿书信集的导言中，她的女儿写道：“很快，她在本来已拥挤不堪的餐室中央形成了一种工作习惯。将稿纸和书籍高高堆放起来，她的写字台总是摆满东西一直连到餐桌上；她见缝插针地写作，她能从照料孩子和家庭主妇的职责中挤出时间。”

在她作为作家的整个生涯中，塞克斯顿与一部分外部强制进行斗争(每每获胜)，包括评价、竞争和奖赏。例

如，她曾写信给她的精神病医生：她因为赢得了一个“赖德克利富奖”^①而成为一位“廉价的艺术”，这种成功对她并不好。不过她也有几次因为得到了巨款而着迷，以致她仅仅是出于金钱的考虑而制订一些创作计划：

关于精神病医生们看不起眼而又有利可图的部分(著书，诸如此类)……我们孤注一掷的尝试，写一些使我赚钱的东西……这被认为是滑稽的、可怕的或有点发疯的，即这不是文学作品，而是一种廉价的、但可能是商业性的东西，用漫画等等补充不足。我不想在上面署上我的名字。不是我的名字不好，而是这本书与我的名字极不相称……

然而，总的来说，塞克斯顿似乎意识到：过分关注奖赏对创作有不良的影响。当她的朋友斯诺德格兰斯(W.D. Snodgrass)赢得了“普立兹诗歌奖”^②时，她告诫她不要丧失他最初的创作内部动机：

妙极了！《心针》是一首伟大的诗。但是，在你的内心，你具有比这首诗更好的诗。你由于它的获奖和它的风行而放荡不羁。现在必须坐下来，写一些更为“真实的”诗……给我写一些充满活力的诗。这就是为什么你最初是伟大的。不要让奖

① 赖德克利富(A. Radcliffe, 1764—1823)，英国著名女小说家，以她的名字命名的文学奖是奖给卓有成就的女性文学家。——编译注

② 普立兹(J. Pulitzer, 1847—1911)系生于匈牙利的美国报人。——编译注

品挫伤你的最初的勇气，一种不同的勇气。保持冷静和那种不同，当没有人真正的想写“真实的”东西之时，那种不同写下了“真实的”东西。因为，那是唯一的能拯救(并且我仅仅指拯救)其他人的东西。视功名为尘土。只有你才是一切。

塞克斯顿对奖赏创造性工作所持的谨慎而又模棱两可的态度，在下面这段摘自她给她的代理人信中的话里表现得淋漓尽致：“我爱慕金钱，这也不是过错，但我首先想写优秀的诗作。在这种愿望后面，我痛苦地为获得金钱和名誉而焚心，为让所有明星黯然失色的念头而焦虑。”

塞克斯顿除了克制自己对金钱的关注外，也竭力避免对外部评价的过份注意。她最早的诗歌辅导老师之一洛厄尔(R. Lowell)曾要她“写十首较为真实的佳诗”，她旋即发现她不能写任何东西，直到她认定洛厄尔的意见是无足轻重的。象其他创造性作家一样，塞克斯顿把出版以及评论界的喝采看成是一种令人成瘾的毒品；起初使人兴奋，但很快就使人错将注意的中心放在人的工作上，而不是感情上。她全力奋斗，坚持对自己的评价，不准外界来支配自己工作的价值和方向。的确，她曾开玩笑地建议匿名出版诗歌，以避免外部出现的这种陷阱。她对乔(E. Tong)的建议(在乔的第二本小说出版以后)表达了塞克斯顿摒弃社会强制的才能：

别沉浸在对书籍的承认上。这种观点的理解应具有这样的因素——你具有一种超越你现时生动活泼的工作的能力，等待着首肯而袖手闲荡是

没有出息的……你有天赋——并且由于它而产生了责任感——你千万不可忽视或者愧对那种天赋——你务必听凭自己所为。它比起渴盼赞同的自我来，有更大的力量。

且不管塞克斯顿偶尔也关注外部的赞美和物质奖励，在她写诗不久写给她母亲的一封信中，她那种主要是倾心于写作的内部满足是一目了然的：

虽然，我写这些诗的方式毫无新颖之处，但是，对大多数诗歌爱好者来说，它似乎是新颖的。我不为他们而写，甚至不为编辑而写。我想发现什么东西，我至少在思考我将要过去的“今天”。我知道，叱咤风云的人物是重要的，但此时此刻，达到我的最佳状态才是最重要的。

不断保持这种内部心向，塞克斯顿常常成功地作为她本人最苛刻的批评家。她不止一次地把诗作寄给杂志的编辑，实际上是要求他们不要将这些诗作付梓，因为它们不能达到她自己的高标准。“现在……杂志的验收工作停止——这肯定是一篇‘平庸的诗作’（塞克斯顿最严厉的批评）。”一次又一次，由于惧怕外部对她作品的评价会导致内部动机的消亡，她就试图毫不含糊地抛弃外部的目标：“我要写好诗的抱负将阻止我去写劣诗。但是，我在什么地方感到一种新的要为写诗而写诗的自信和胆量时，我便放弃写好诗的目标，我将会（我希望）再次酷爱我的诗作，象儿童那样表现它们……即便它们是很不象话的。”

三、西尔维娅·普拉斯：与外部强制搏斗的败北

如果说，安妮·塞克斯顿似乎主要是受内部动机的驱使，那么，普拉斯(S. Plath)在她的极大部分的生涯中，与某些强大的外部动机进行的抗衡，似乎没有成功。她很早就出版了诗和小说，名声鹊起，迨止她从史密斯学院毕业那年，已获得了多种写作奖，在全国性杂志上出过风头，当过《梅德莫耶赛勒》杂志的特约编辑，赢得了在剑桥学习的“富弗赖德奖学金”。然而，一种重新获得早期这种成功的愿望似乎是相当无效的，在后来几年，固执己见的作家群苦苦折磨着她：“突然，我的生活变了，或者说似乎什么也没有了，这种生活本来已定好短期目标和长期目标——一个史密斯奖学金，一个史密斯学位，在竞赛中独占鳌头的一首诗歌或一部小说，一个‘富弗赖德’，一次欧洲旅行，一位情人，一位丈夫。”

普拉斯同许多社会强制作斗争。在整个痛苦的青春期和青年期中，她不断想象到传统婚姻对她的创造性可能产生的破坏性影响：“我祈求着最终将毁灭我的事……我不知道从正规的和日常的生活中分离出来的艺术，是否同与生活相结合的艺术一样活力盎然。用一句话来说，婚姻会逐渐侵蚀我的创造性、吞噬我写作的愿望和形象化的表达方式吗？”

毋庸置疑，在普拉斯大学毕业以后的岁月里，尽管妨碍她写作的最大阻力是某种外部强制，但这种外部强制可能不会是所有其他任何社会问题，而是由外部评价而作的期望以及伴随而来的她对外界承认的关切——它似乎神不知鬼不觉地损害着杰出人物的创造性。普拉斯对外界承认异常